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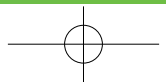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4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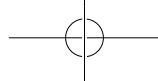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研究院简介

“博雅工作坊”第三工作间 中东的历史变迁与新问题 2018年4月12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学术研讨会第三工作坊围绕着中东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分成两场，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主任吴冰冰老师是上半场的主持人，下半场的主持人是杨光教授。

首先发言的是华黎明大使，他曾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波斯语翻译，1988年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1991年至2001年先后出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发言的题目是“后ISIS时代的中东”。冷战结束后，美国独享中东霸权十年。911终止了这种局面，两场战争和2009年实行战略东移之后，客观上这个地区原先在“一超独霸”格局下实现的稳定被打破了，于是就出现了俄罗斯加入和沙特、伊朗、土耳其及以色列四强博弈的新格局。

2014年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是911和“阿拉伯之春”的混合产物，伊拉克虚弱的中央政府和叙利亚内战为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绝佳的温床。ISIS是史上第一个攻城略地的恐怖主义武装组织，一度受到沙特、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的支持，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极端分子加入其中，目标是推翻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建立东起伊拉克西至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哈里发国。2015年后，打击ISIS恐怖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俄联手展开军事行动，ISIS作为一个拥有领土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历史至此终结。但是，后ISIS时代的中东局势将更加复杂，矛盾更为尖锐：



一、ISIS 只是失去了土地，恐怖主义依然猖獗。ISIS 虽被击溃，但基地组织依旧拥有强大的组织，“解放沙姆圣战团”已深深植入叙利亚反对派内部，这几年基地组织乘 ISIS 得势成功重建，正在 ISIS 的残兵败将中招兵买马。ISIS 分子逃离叙利亚，分别回到自己的母国，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明显增加。

二、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将结成同盟加紧围剿伊朗。伊朗与世界六强签订核协议，与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结盟，直抵以色列边界，重绘中东地缘政治地图。沙特和以色列十分焦虑。叙利亚战争延续六年之久，导火索是“阿拉伯之春”，缘起却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伊朗结盟。

在后 ISIS 时代，沙特-伊朗矛盾成为关键，巴以冲突被边缘化。以色列将注意力转向伊朗，视伊朗为头号敌人。以色列和沙特这两个一度敌对的国家已结成了反伊朗的“非神圣同盟”。沙特与伊朗的矛盾已远远超出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之争的范畴而成为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

今年五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核协议的新政策将出炉，中东的代理人战争演变成美伊或以色列与伊朗直接交手的风险也随之加大。

三、中东将重新成为美俄博弈的平台。叙利亚战争初期，局势由美国、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主导。2015 年俄罗斯以反恐名义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与伊朗一道挺住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叙利亚战争为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对冲美国的压力提供了机会，还与土耳其化敌为友。

四、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进退成焦点。奥巴马执政八年，在中东力图减少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敌意，与以色列拉开距离，拔除伊朗核问题的引信，避免美国在中东再度卷入战争。

特朗普入主白宫几乎颠覆了前任的中东政策。他高调挺沙、挺以。半年后他宣布要改变伊朗核协议，指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不久前，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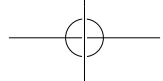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特朗普对他的中东政策迄无系统的表述，不过他入主白宫十个月来对中东地区的言行表明，他的中东政策无非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衣钵，彻底否定奥巴马，走右派民粹主义之路。

特朗普的新中东战略，为摆脱自己的国内困境寻求出路。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因“通俄门”事件被民主党和媒体穷追不舍。共和党能否保住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关系特朗普未来三年执政的地位，而解决这一困境最重要手段就是巩固选民票仓，兑现诺言，讨好犹太人集团，这要求他必须敌视伊朗，对以色列殷勤。也许在未来特朗普在中东还会有“狠招”，但是毕竟美国的实力今非昔比，他的言行不得受美国国力的制约。美国今后的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如何定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中东国家边界将彻底动摇。库尔德人在战败 ISIS 中建功立业，势力空前壮大，后 ISIS 时代库尔德人建国的势头已不可逆转，叙利亚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三足鼎立，南北也门分治似乎已成定局。

六、ISIS 的覆灭未能成就中东各国的内部稳定。二战以来的军人专政、君主制或美式民主都未给中东带来自强和复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东还有庞大的市场，各国内部都潜伏着巨大社会矛盾，加上战争和难民潮的叠加，一国或数国内部局势动荡随时可能发生。

七、伊朗问题仍将高居中东榜首。2017 年底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激起了巴勒斯坦人、阿



拉伯人、全球穆斯林的愤慨和国际社会异口同声的谴责，巴以建国的和平之路再遭挫折，巴以冲突被重新炒热。巴以是否会再起冲突，中东是否会爆发第六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和沙特是否会调转已经瞄准伊朗的枪口？

二十世纪中东爆发五次战争的历史背景是：一、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视巴勒斯坦的领土主权为他们的核心利益；二、阿拉伯国家有前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支持。如今这两个条件已不复存在。但是当前阿拉伯国家执政者们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具有拥核潜力和什叶派同盟的伊朗崛起，油价下跌和财源枯竭。国内政局不稳以及叙利亚、也门战争产生的骨牌效应，而巴勒斯坦问题的炒热，又为伊朗高举反以大旗增添了政治资本，沙特和以色列正期待美国特朗普政府彻底抛弃伊朗核协议再度制裁伊朗。此时此刻，沙、以绝不愿为了圣城问题放弃对伊朗的聚焦。

吴冰冰老师表示华大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也一直在深度地关注中东，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刚才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全球的视野，从七个角度分析了中东地区发展的趋势，而且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做了一些结论性的很有启发性的阐述。比如说 ISIS 的崛起是 9.11 与“阿拉伯之春”混合的产物，还比如说提到特朗普实际上在中东的政策是一种右派民粹主义，但主要是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寻求一个政治出路。这些问题都值得非常深入地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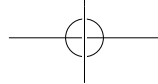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第二位发言人是杨光教授，杨光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系博士生导师，中国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前任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发展问题、国际能源安全问题和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关系问题，1993 年以来，获中国政府的特殊津贴。杨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东的政治与经济”。

杨光认为中东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探索既是一个历史变迁问题，也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仍然值得关注。

最近 60 年左右的时间，中东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探索。一是探索了伊斯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探索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三是探索了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道路；四是探索了地租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道路，至少有这四种。这几个方面的探索应该说基本上到现在都没有成功，或者说有的探索还不能证明它一定能够走得通。

关于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探索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突尼斯、苏丹，也包括 80 年代以前的以色列也是走这条道路，叫犹太社会主义。这种探索是通过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它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依附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特别是采取国有化、计划化这样的方法，来推行所谓的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但是到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是以陷入债务危机而告失败了。这些国家采取的往往都是膨胀式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举内债和外债，来勉强维持这样一些项目，最终造成了难以偿还的债务负担。

第二个方面的探索，叫新自由主义的探索，这是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这个结构调整的方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了这些中东的国家，其中的大部分要求是进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东国家没有办法，为了获得新的贷款，为了减免债务就只好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其中一是宏观经济稳定化，二是资产交给市场，三是国有企业自由化，四是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基本上是这“四化”。造成严重的影响，就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从此失去了动力。出现了工业发展停滞，甚至所谓



去工业化的现象。导致后来“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失业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探讨是伊斯兰主义。中东有一些国家主张要搞伊斯兰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里边比较突出的比如有伊朗和巴沙尔初期的叙利亚，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后的埃及新政权和突尼斯的新政权都试图采取伊斯兰的经济模式进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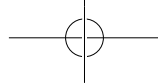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第四是关于地租经济多样化，地租经济主要指的是石油、天然气输出国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产性的收入，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资源禀赋，而出售这种资源禀赋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幅度的级差地租。当然这些国家也认识到，油气不能永远依赖，因此普遍采取经济多样化政策，但是现在这些国家对石油收入的依赖程度依然非常高。

杨光教授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经历来看，总体上来讲不能说是成功的。如果要从哲学的高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他们总体上还是没有解决好发展意识和发展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意识就是发展的理念、理论、战略，存在就是他们现实发展的情况和条件，就是我们讲的国情。这两个东西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伊斯兰主义的模式，实际上陷入一种唯心主义和宿命论，依靠伊斯兰教的经典来治理经济，不可能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些发展中的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探索当中，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教训。杨光教授觉得有两个半国家是成功的。一个是土耳其，第二个以色列，半个国家是迪拜，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石油地租经济，但是至少它的产业结构转型是成功的。因此，这样一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值得研究，继续为研究和认识中东国家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吴冰冰老师指出杨光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中东研究，就像刚才华黎明大使的报告一样，杨光教授的报告也是从全球的广度、历史的长度、社会的深度、理论的高度从经济方面全面阐述了对中东问题的理解，对大家来讲有一种框架性的认识和结论性的认知。

第三位发言人张倩红教授是郑州大学副校长，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世界史专家，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犹太以色列史、中东史。张倩红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中国这两年跟以色列的创新伙伴关系在国家层面一直在推进落实。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在几个排名榜上都是国际领先，从2011年以后，以色列是创新驱动型国家这样一个定位。

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来自于它的科技研发能力。以色列国家特别地重视科技研发，可以说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教育的理念和科学的理念确实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科教立国一直是它的长期国策。国家的科技政策是不断调整的，从1949—1969年这20年时间是国家主导，当时推行的是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的话语之下，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科技研发，各个部委的积极性没有很好地调动。1969年就把研发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改成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各个部委成立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来主导这个部委的研发，首席科学家本身就是科学家，他们制定国家的研发计划，对全国进行发布。所以它的首席科学家制度是比较成功的，这个政策一直推到了2016年又进行改革，各个部门比如说经济部的首席科学家、工贸部的首席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真正像国计民生重大的科研项目还需要政府推动，所以它又进行改革。2016年又成立了国家技术与创新总局，政策是在不断地变化。



关于促成科技研发的国家法律。最典型的就是 1984 年的产业研发促进法，这个政策当时规定要把研发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策进行推进。以色列的研发后面投入一直是比较高的，现在一般认为创新驱动国家的研发投入要达到占 GDP 的 2% 以上，以色列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超过 4%，高科技对这个国家工业出口的贡献率，到 2015 年超过了 80%。

以色列国家创新体系分三块：政府主导的创新，高校主导的创新，还有企业主导的创新，这是它自己认定的一个创新生态系统

以色列的人才储备分两块，一个是它本身的人才培养，以色列长期以来保持了教育的高投入，教育占 GDP 的比重从 50 年代到现在都超过了 10%，即便是有战争发生的年代，它的教育投入都是比较高的。还有很大的一块是移民，高技术移民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仅仅自己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这个国家发展的需求。高技术移民里面，俄裔犹太移民为这个国家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除了研发、教育，以色列还有一方面，也算是它的创新的一个基因，就是它的文化。其实文化对于这个民族创新是更重要的，很大程度上他的思维模式、他的处事方式是他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犹太人的文化基因里边，确实有很多是鼓励创新的，鼓励他走出去接受新的事物。其中一点就是他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犹太文化里面选民的意识，改变世界的观念，自我实现的气概，都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根源。犹太民族崇尚智慧、崇尚知识，他们对知识的追求一直存在。以色列建国以后，第一部法律是教育法，还有他推崇集体，张扬个性。再有就是挑战权威、鼓励争论。

还有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是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在部队里面着力打造一种没有等级的社会，以色列人写的关于创新的书，都要谈部队是一种大熔炉，是对人创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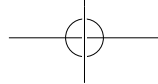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维的鼓励。还有以色列有一个特别包容失败的环境，以色列认为全世界有两个最包容失败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冰岛。

以色列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以色列创新的枯竭可能就是由于人才的流失和科技研发的带动力不足，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即它政局的不稳定，复杂的地缘环境都是它的国家发展面临的很大的瓶颈，同时还有军工的发展对民用发展的挤压。还有科技事业的国民参与率很低，这个国家 100 万的阿拉伯人，他们也参与不到或很少参与到高科技的研发、风投这种企业里边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另外还有一点，全球竞争态势下，它的比较优势在弱化，现在很多国家无论教育投入还是研发投入，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资源的投入，都使以色列的优势在弱化，这一切都会成为制约这个国家发展的因素。

吴冰冰老师称赞张倩红教授的报告讨论了以色列这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创新体系，在阿拉伯国家里边确实还找不到，现在可以看到阿布扎比在奋起直追，像埃及这些大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迅速。

上半场的最后一位发言的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咎涛教授，咎涛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咎涛老师发言的内容是他这些年研究土耳其世俗化问题取得的新成果，这个研究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跟一般的历史学论文还有一些差别。问题的起源，或者他对话的对象既包括学术界的以往的研究，也包括当前比较热点的一些舆论性的观点。资料上主要使用的是公开发行的土耳其的一些官方文书的汇编，包括现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各种政党的政策文件，还有土耳其人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部网站的一些官方的资料。



现在存在着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土耳其在正发党统治以后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对土耳其的各种讨论都出现关于宗教激进化的说法。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认识现实的问题需要引入规范研究的视角和历史的视野，这样对我们认识现代问题有所帮助。

从规范研究角度来说，所谓的政教关系，或者说世俗化、世俗主义，都不是轻轻松松可以谈出来的问题，政教关系具有一定的描述性，一旦涉及到世俗化和世俗主义，如果从社会科学规范的角度来说，世俗主义这个词的核心是政教关系，跟政治机关和政党有关，是政治领域，而宗教更多地为社会领域。当然，它也是有组织性的，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分离，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完全被明确地说是政治和宗教领域截然分开的现实体制。关于两个世俗化模式的讨论，一般是这样说的，英美新教国家的模式和法国模式，一般把前者说成是一种消极主义，比较强调政教之间的互不干涉，法国的模式被界定为一种积极的模式，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对宗教的管理。从概念历史的角度来说，在奥斯曼帝国晚期，1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以说是日益加深的世俗化进程，但并未出现世俗主义的概念，世俗主义的概念在土耳其国家是革命色彩很强的，甚至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土耳其很强的意识形态，它是最核心的主义，也是争议最大的意识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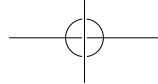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规范的意义上，我们来谈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尤其是回应现在土耳其正在经历伊斯兰化这类观点，到底是哪一个层面上的世俗主义出现了危机？笞涛老师并不认为当代的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治已经改变了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也不是说它仍然完全地一以贯之地坚持原有的奠基于凯末尔时代的世俗主义。这些伊斯兰化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质性挑战世俗化。伊斯兰化的标准就是否定原有的世俗主义，实行以沙里亚作为基础的政教体制。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实行这种政策。

涉及的主要都是习俗性的、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变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政治管理、宗教体制的变化。原来的世俗主义当然强调的是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国家的各种事情都应该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现实利益的考虑之上，而不是出于宗教原则。现在它强调要公平对待无论是哪种信仰的、包括愿意选择保守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他们也应该得到尊重，其实是这个意思。世俗主义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世俗主义，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变化而已。

另外，宗教事务部符合原来所说的法国模式的那样一种国家管理宗教的模式，但是国家的主人是会变的，民主化以后，各种势力都可能借助于选举上台，正义发展党最终上台，管理国家宗教事务的宗教事务部的决策会随着有所变化，这是宗教服务于政治的典型的表现。

笞涛认为土耳其当前的世俗主义，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未来会怎么走，他个人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埃尔多安。

点评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老师认为中东不可回避一个现象，就是经过中东但却绕过中东，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对重要国家的认知可能没有像华大使那样做到深入和系统，比方说他谈到回流、独狼这些问题，实际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第二，关于特朗普的选民政治，她非常认同。第三，特朗普政府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会对我们“一带一路”和伊朗对接一些项目产生直接的冲击。杨会长提出一个问题，“一带一路”要和沿线国家对接，我们更多从自我出发，潜台词就是我和你对接首先满足我的需求，但我没搞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要异国施策、因国施策。马丽蓉认为学者要做的是怎么能够把中国的道路展现给他们。张倩红老师谈到了创新力，创造和创新竞争力的问题，以色列四大成功要素，第一是人，第二是制度，但是核心的核心还是它的文化基因。



管涛老师带给我们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我们有时候总说中东政教复杂，研究对象确实复杂，但是不是我们的阐释力不够，使得这个问题越说越说不清。中国学者应该回到概念，回到理论，回到问题导向，最后又要到研究范式上。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深化过程。

下半场第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副教授，他做了题为《百年耶路撒冷和中东局势变迁》的发言，从中东格局的视角探讨了耶路撒冷问题。王锁劳教授认为，近百年来，中东地区共发生了四次大的格局变迁：

第一次格局变迁发生在 1917—1918 年，这次格局变迁主要是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中东转换为英法控制下的中东。这次格局变迁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犹太民族的建国理想开始得到大国的承认，典型的标志是 1917 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其次 1917 年 12 月，英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向英军投降，此后英国支持犹太移民。当时中东地区国家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主要是域外大国，如英、法，特别是英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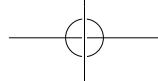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第二次格局变迁发生在 1947—1948 年，这一时期正是全球冷战的开始，美苏开始介入中东事务。在这次格局变迁中，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替代了英法在中东的传统地位，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格局变迁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是犹太民族的建国理想得到了实现，这就是 1947 年联合国分治决议，以及 1948 年以色列的建立。此后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7 年到 1979 年，在这一阶段中，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除了美苏两大阵营之外，还包括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第二个阶段是从 1979 年到 1991 年，在这一阶段中，伊朗作为一个重要地区力量开始崛起，而埃及 1979 年开始成为美国

的盟国，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个时候它在一定意义上不再带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打仗了。与此同时，伊拉克高举阿拉伯民族伟大旗帜，一定意义上接替了高举民族大旗的埃及。

第三次格局变迁发生在 1991 年。1991 年，从国际方面来看，苏联解体，两级格局终结。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领导多国部队打垮了萨达姆，一定意义上遏制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时美国开始主导中东和谈。1991 年 11 月份的马德里和会，开启了中东和谈。这一时期伊朗仍然高举反美反以的旗帜，同时伊核问题开始出现，90 年代很大程度上是伊朗与美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对抗，与此同时，其他的行为体开始出现了，次国家行为体如基地组织开始崛起，如哈马斯在 90 年代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阿拉伯国家由于与美国结盟所没有发挥的抵制以色列的作用。

第四次中东格局变迁发生在 2011 年，划分的理由是，2011 年，奥巴马上台以后提出了从中东撤退，正是在 2011 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了所有的战略部队，这次撤军为 ISIS 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一定意义上美国从中东撤退为中东其他国家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此外，2011 年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美国的盟友埃及垮台，伊斯兰主义上台掌权。到了 2014 年，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上台，即 ISIS。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中东国家土耳其开始实施它的东向战略，热衷于在中东发挥它的作用，此外俄罗斯重返中东，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就目前的中东局势而言，可以沿用一超多强的说法：一超就是美国，多强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几乎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在中东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东地区存在五强，包括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和埃及，尽管埃及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其作用仍然不能忽视。而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角度看，中东地区存在三大势力：一是伊斯兰国，尽管伊斯兰国在物质层面已经被打垮，但是其势力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二是穆兄会，不仅是埃及穆兄会，利比亚穆兄会等相关组织都在这些国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三是一支近几年凸显的力量，就是库尔德民族力量，包括叙利亚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人，甚至是土耳其库尔德人。

总结而言，百年中东所发生的每一次重大格局变迁，都使犹太民族的复国理想更加接近目标的实现，耶路撒冷越来越犹太化。而阿拉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现在一些阿拉伯主流大国甚至不愿意发挥这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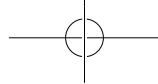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牛新春发表了题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的发言，围绕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牛新春总共讲了五点：一是美国的中东战略收缩的整体态势没有变；二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工具没有变；三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改变；四是美国在中东的做事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是特朗普如何来处理目前的化学武器使用问题。

首先讲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收缩态势没有变，从 2011 年开始，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在收缩，特朗普上来这个态势并没有变，回看一下美国的中东政策，可以发现与大家一般的印象不同，美国在中东大规模的军事卷入时间很短，1980 年之前，美国在中东未部署有战斗能力的军队，从 1980 年以后，才有了有战斗能力的军队在中东部署。美国在中东实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干预是 1990 年的海湾战

争。美国的战略收缩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2011 年撤军到特朗普上台，基本保持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美国的战略收缩体现在美国战略目标的收缩，或者美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对中东国家的承诺减少了，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对中东的战略目标是美国要改造中东，美国要在政治上让中东变成一个民主的中东，在经济上要让中东变成一个自由主义经济的中东。而今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对中东的战略目标是：美国不允许恐怖分子在中东建立根据地；不让中东的动荡影响国际能源的稳定；不让敌对国家控制中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删掉了民主改造中东的内容和保护美国盟友安全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当沙特、以色列、埃及这些美国的盟国如果遇到外部的威胁，美国会不会出兵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美国大规模军事干预中东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不管是特朗普上台，还是其他人上台，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第二是美国的政策工具没有变。2011 年美国干预中东最重要的手段是军事干预，尽管现在还有军事干预，但是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变成了空中干预。从 2011 年到现在，美国在中东没有出动地面部队，空袭已成为美国干预中东的主要政策工具，因为空袭最简单，空袭不会对美军造成伤亡，想撤的时候就撤，想空袭的时候就空袭。未来美国干预中东的手段肯定是空袭，不可能出动地面部队，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政策工具；

美国的第二个政策工具就是靠盟国在地面上的支持，特别是最近半年，特朗普说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变成了遏制伊朗，但是美国不会亲自去遏制伊朗，而是希望其他国家去遏制。主要依靠欧洲、中国、俄罗斯来遏制。5 月 12 号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即使特朗普不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和伊朗也没有金融和贸易上的往来，跟美国遏制伊朗是一样的。



关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改变，第一是政策变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一方面是抑制或者遏制美国盟国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跟自己的敌人搞缓和，奥巴马希望一方面压制盟国，另一方面让盟国和敌人之间达成妥协。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跟沙特的关系恶化了，跟以色列的关系恶化了，但是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缓和了，美国人主张沙特、以色列应该跟伊朗共享中东的政治。奥巴马的意思是通过缓和调停来达到中东的和平。而特朗普的政策是，敌人就是敌人、朋友就是朋友，支持沙特和以色列，同时遏制伊朗、制裁伊朗，这是很明显的政策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行事风格的变化。奥巴马在任的时候，对任何一件中东的问题奥巴马总是希望搞平衡，考虑各种关系、各方面的利益，中东的事情都是很复杂，任何事都涉及到各方利益。特朗普上任以后不是这样，他主张要解决哪个问题就解决哪个问题，比如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说打击伊斯兰国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一直不愿意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人，因为奥巴马知道如果武装了反对派，伊斯兰反对派迟早是个麻烦；如果武装了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迟早也是个麻烦。但是特朗普不管这些，他认为打击伊斯兰国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特朗普开始大规模地武装库尔德人，结果库尔德人又成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问题。与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相比，特朗普政策的好处就是比较有效，但缺点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来五个或者六个新问题。这是行事风格发生了变化。

最后一点是化学武器问题，最近发生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事件，从逻辑上来说，任何一方都有幕后操控的可能：叙利亚政府可以借化学武器试探一下美国的底线是什么；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可以以化学武器为借口，找个机会直接介入叙利亚局势，遏制伊朗、俄罗斯的势力；沙特和以色列也可以借化学武器事件将美国留在中东，共同对抗伊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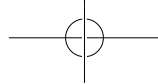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化武事件发生，美国对之做出反应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奥巴马开始到特朗普，美国在叙利亚的底线就是化学武器。如果出现化学武器，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要维护它的信誉。美国必然会对化武事件作出反应，并有如下三种可能应对的手段：

第一，美国要借这个事情真正地敲打俄罗斯跟伊朗，在不跟俄罗斯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对叙利亚发起导弹攻击，这样美国跟俄罗斯、伊朗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把俄罗斯、伊朗激怒了，危机有可能会扩大。这个选择对美国比较有利，但是后果也很严重。

第二种选择跟去年一样，事先跟俄罗斯协商，甚至通过俄罗斯告诉伊朗，这样风险就小了，震慑俄罗斯和伊朗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第三种选择危害更小，就是美国、英国、法国联合起来，对俄罗斯、伊朗施加新一轮制裁，这种手段长远来看对俄罗斯的威胁就很高了。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林丰民教授作了题为《沙特女权的变化》的发言，这是关于沙特改革的重要议题。林丰民教授认为，这两年沙特的两性生存状况的变化非常大，以前，沙特的两性状况比较低，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在130个国家的女权状况排名中，沙特排在第127位。这个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但在沙特相对来说更极端，沙特的两性隔离状况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戴面纱，阿拉伯世界很多女人也戴面纱，但是沙特是最普遍的，并且任何进入到沙特境内的女人都必须戴面纱。其次是沙特的两性隔离，女性不能自由参加公共活动，包括不能自主出行，



一般情况下要有男性亲属陪伴；此外，沙特女性基本上没有恋爱婚姻的自主权，自主谈恋爱相当于通奸，通奸处罚的结果是要乱石击毙，或者刀砍、活埋等，与此相关的罪名叫名誉罪。此外，沙特女性的政治权利基本上等于零，不仅没有被选举权，连选举权也没有，妇女在这方面等同于儿童。

近几年沙特的女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政治方面，沙特女性可以接受教育，虽然也存在两性隔绝的情况，男生女生不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但是男教授可以给女生上课。政治权利方面，一直控制得比较紧。2011年阿布杜拉提出2015年女性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先例出现之后，女性选举最后可能扩大到全国。沙特王储最近发表了一个讲话，称沙特女性不一定非得戴面纱不可，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不戴面纱了。

第三是沙特女性可能可以开车了，原来在沙特，女性是不能开车的。1991年的时候曾经有十几个女性一起结伴在沙特大街上开车示威了一下，结果就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和批评。沙特宗教人士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淫荡行为。最近沙特有一些男性也觉得还是应该让女性开车。

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政治领袖的支持与政治利益的需要。政治领袖的支持实际上对于推动沙特妇女的解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沙特王储在这方面迈的步子也比较大，对他来说允许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利，就是他的政治利益，因为阿布杜拉国王提出女性可以参与选举，未来如果所有的沙特成年妇女都可以选举的话，这就是50%的选票，而王储现在正处于尴尬境地，他要接班，可是王室的阻力很大，如果不能顺利接班，他有可能通过选举在妇女那里获得一半的选票，他在努力争取女性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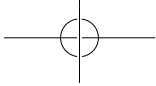
第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这几年沙特因为打也门战争，以及支持一些国家，财政消耗非常大，而石油价格跌得很厉害，这影响了沙特的收入。如果妇女解放了，妇女也可以参加生产和建设，这对于经济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将来妇女能够自由地上街的话，她们就可以自由地购物，这肯定会促进消费规模。

第三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带动，包括他们从一些报刊的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所了解到的其他国家的那些阿拉伯妇女的开放程度，这个对她们也是有触动的。

第四是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通过这些媒体传达了外界的信息，让沙特妇女能够了解外部的世界，能够了解外国妇女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对她们的触动很大，让她们感觉到自己需要改变，变得像外国女人那样有自由、有属于自己的权利。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兼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对几位教授的发言做了点评，他认为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中东百年变迁，把比如像耶路撒冷这样的老问题放在百年变迁的历史中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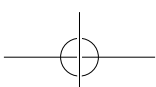
中东的常态被打断了，以前，中东国家崛起以后成为帝国，或者成为核心国家，它能够主导中东地区的国际秩序，能够左右中东地区的利益格局。一战以后，这种情况被打断，随着殖民体系的出现，主导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力量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即域外大国操纵中东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外部对中东格局变化的主导性，另一方面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伴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收缩，以及很多国家内部的动荡，多种行为体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这是中东国际关系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带来更多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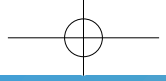


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特朗普的中东观。特朗普的中东观有几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对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文明的态度，从禁穆令就能看出来，他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明充满敌意。特朗普在中东的表现是我们认识他的重要渠道。

当前，沙特的变化聚焦点很多，其中妇女地位的变化是最令人关注的，这一两年沙特的变革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妇女方面，第二个是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以前很少看到有沙特包括宗教人士出来为王储言论做注解，这种情况影响深远。再一个就是他的反腐。所有这些都让人有新沙特呼之欲出的感觉。新王储冲破禁忌推动变化，这其中的风险有多大？这可能是我们最为关注的。

随后，吴冰冰宣布本次讨论圆满结束，并感谢各位发言者、点评人与听众的积极参与。





记录：程艳梅

整理：张江龙、王页天

审稿：翟崑

